

#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 ——中国同盟会

##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

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近代阶段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的产生，亦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近代新兴的阶级力量——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结果。

自明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就已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封闭大门的被打开，外国资本大量侵入。开商埠、办通商，投资设厂等接踵而至。“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sup>①</sup>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内一些有识见的封建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为寻出一条御侮、制内的“求强”“自新”之路，开始学习西方“长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编练新式海、陆军，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此后，洋务派又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了一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些近代民用工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促使他们纷纷投资近代企业，这样就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据统计，从 1869 年到 1894 年的 25 年间，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约有 130 余个，资本总额达 500 余万两，雇用工人 3 万左右，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中艰难地产生出来。尽管中国资本主义有种种弱点和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对中国社会有巨大影响的阶级——资产阶级开始形成。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环境和生长基础的差异，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由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大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亦即中国早期的大资产阶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具有比较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

另一部分是由手工业工场主和中小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亦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处处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处境较为艰难，因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政治要求更为强烈。但是，由于他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求生存，图发展，又不得不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发生某些联系，因而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时，又往往表现出妥协性和软弱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治上的双重性格，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母体铸造出来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就发展资本主义而言，他们又有某些一致的共同要求。这就决定了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新崛起的政治势力——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

## 二、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勃兴

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扰的加剧，以及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扩大，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冲破“夷夏之防”的樊篱，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其中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许多人所接受，对洋务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洋务”的兴办，扩大了中外交流，关于外部世界的各种新信息纷至沓来，从而促进了人们对西方社会包括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了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逐渐醒悟到，中国不仅“器”、“术”不如西人，“体”（政治制度）亦不如西人。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郑观应、王韬等提出了“君民共主”的主张，实际上要用君主立宪制度代替“一人秉于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到八九十年代，崔国因、张树声、汤震、郭嵩焘、黄遵宪等一批人又展开了一场“设议院”的讨论，并把设议院作为本、体而列为中国自强的首要措施。这说明当时有识见的人们对中国君主专制弊害的认识已逐渐深刻。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震惊了国人，使人们对清朝政治腐败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宣传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终于导致了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改革方向的百日维新运动的发生。百日维新运动虽然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淹没在血泊中，但维新志士们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在当时却起了震耳发聩的作用。而这一时期维新志士们所设立的数十个学会、报馆、学堂等，在开启民智、培养建立民主性团体的新风，及宣扬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更是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在维新派、改良派宣传君主立宪思想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也在探索中国政体改革的途径。到1894年兴

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终于下决心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创立合众”政府。所谓“合众政府”，亦即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从此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即把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君主专制政体，创立民主共和制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同时，还着力宣传介绍了西方的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如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国新报》、《国风报》等，多次刊登介绍西方政党政治的文章。有的文章着重对西方国家政党动向和组织演变情况的介绍，有的则着重对政党理论和学说的介绍。如罗普写的《政党论》在《清议报》上连载数号，对政党的定义、特征、作用等进行了分析阐述。其他作者以《政党论》为标题写的论文，也曾出现在《中国新报》、《政论》、《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许多文章都明确表达了其热衷于政党政治的思想倾向。《清议报》第 78 号发表的《政党说》公开宣称：“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该报第 79 号刊载的（论非立大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一文，公开呼吁，要挽救中国以未亡“非立大党 实行政党政治不可。”

与此同时，有关政党问题的译著也逐渐增多。如《明治政党小史》、《欧美政党论》、《社会通论》等书相继出版 这对政党观念的传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时期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和介绍西方政党政治。如孙中山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指出：“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也。甲党执政，则甲党所抱之政策尽力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策，以图进步焉”。鼓吹政党政治最力的宋教仁则着重强调调纲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他曾指出：“夫政党组织

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 未有政纲不善 而犹独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sup>①</sup>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在政党政治的宣传上存在差异，前者主要倾向于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下的政党政治，后者主要倾向于美、法式的政党政治。但二者主张结束君主专制，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要求则是基本一致的。

资产阶级各阶层对包括政党在内的民主思想的传播，冲破了“万世一系”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樊篱，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为中国近代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 第二节 孙中山与兴中会

### 一、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活动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比较严格和更为完全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明德，号日新，乳名帝象，及长改日新为逸仙。后因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被尊称为中山先生，孙中山一名由此而来。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孙达成先后做过鞋匠、更夫，并佃种几亩薄田以维持生计。因为家境困顿，他直到10岁才到本村私塾读书。幼年的孙中山，饱尝了艰辛与苦难。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离开故乡，远涉重洋到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孙眉本是为穷困所迫到海外谋生的，经几年艰辛创业，这时已成为一名华侨资本家。通过这次海外之行，孙中山

<sup>①</sup> 宋教仁：《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宋教仁集》上册第23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sup>①</sup>在檀香山，孙中山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的学校，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熏陶。1883年他返回家乡。

旧貌依然的家乡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化文明形成强烈反差，他深感改革弊政和剔除陈规陋习的必要。不久，他因与好友陆皓东做了一件破坏北帝庙神像的事，为乡里不容，又被迫赴香港读书，并和陆皓东一起洗礼加入基督教。在香港期间，他先后在拔萃书院、中央书院、西医书院等校读书，结识了何启、郑士良、胡礼垣、王宠惠等一批有为青年。其中，他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鼓吹革命，抒发救国抱负，被人称为“四大寇”。1885年夏，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胜而怯战求和，使孙中山甚为痛愤，自此“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sup>②</sup>

1892年夏秋，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相继在澳门、广州挂牌行医。目睹国病民穷的现实，他深感“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遂决心做一个医治整个中国病痛的“医生”，积极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翌年冬，孙中山曾与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等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组织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当时没有建立具体组织。

这时的孙中山对统治阶级某些上层人物尚存有幻想，认为通过“求知当道，游说公卿”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1894年春夏之交，孙中山专程赴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采用先进科技，发展工、农、商业，改革教育制度，以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这是

佚名编：《总理遗墨》，影印本，第3页。

<sup>②</sup>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富强之大经 治国之本。”<sup>①</sup> 这是孙中山最早提出的改良救国大纲，他那欲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心情溢于言表。不料李鸿章拒不见他，且把他的建议置于一旁。孙中山希望通过上书请愿来促使政府奋起的幻想破灭了。随之而来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使孙中山认清了清廷的腐朽无能和不可救药，遂“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自此，孙中山坚定走上了组织革命团体，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 二、兴中会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894年10月，已坚定革命志向的孙中山又转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反清斗争。虽然当时檀岛侨民“民气未开，人心固塞”，应者寥寥，但在孙中山努力下，仍获孙眉、邓荫南等数十人的同情和支持。

11月24日，孙中山假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的寓所，召开兴中会成立大会。与会的有何宽、邓荫南、李昌、宋居仁等20余人，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该章程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万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在九条规章中还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从而喊出了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规定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sup>①</sup>该誓词虽然在形式上还有旧式会党的某些痕迹，但就实质内容来说，已经把推翻清朝统治与实现共和政体的近世民主政治思想联系起来，使兴中会成为与旧式会党有本质区别的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已开始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初有组织的阶段。

对当前的活动方针，兴中会虽然没有作文字上的规定，但实际上包括立党、宣传、起义三项。孙中山在《中国之革命》一文中曾指出：“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以实现，先破坏，后建设，于是有起义”。由此可见，兴中会成立后，就把发动武装起义列为其主要的活动内容。

为了便于组织国内的反清斗争，孙中山于 1895 年 1 月由檀香山转赴香港。到港后，他召集旧友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商议，拟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得到大家赞同。为扩大组织，孙中山又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等取得联络，商定共同组会。2 月 21 日，兴中会总部正式宣告成立，假香港中环士丹顿街 13 号为总会所，对外以“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

会上修订了原兴中会章程，使其内容更加具体充实，反清革命色彩更加明显。新章程引言更加明确地指陈了清王朝的腐朽衰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遍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sup>②</sup>引言再次强调指出了中国将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局面，发出了拯救国家、人民于水火的强烈呼吁。章程条文也

<sup>①</sup>《孙中山年谱》第 28 页。  
<sup>②</sup>《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1 页。

从 9 条扩充为 10 条，其主要项目是：会名宜正；宗旨宜明；志向宜定；人员宜得；交友宜择；支会宜广；人才宜集；款项宜筹；公所宜善；变通宜善。这 10 条章程，涉及组织、政纲、制度、人事等项内容。如第三条提出的“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四端，实际上是兴中会首次阐明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章程第一、六等项所提出的“分会散设各地”、“支会宜广”、有志之士可“随处自行立会”等内容，则规定了兴中会松散灵活的组织原则。

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等即积极联络广州附近的会党、防营，准备于 1895 年 10 月 25 日（旧历重阳节）在广州发动起义。总部议定，由孙中山偕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到广州建立组织，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送枪械。

重阳节前夕，各路队伍准备就绪，待命举事。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帜。万事俱备，只等杨衢云从香港派突击队来。但不料杨衢云在香港准备的武器、人员不能如期到达，加之起义消息泄露，清廷遂加强戒备，并在广州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 40 余人被捕。经过 10 个月专心准备的广州起义终告流产。

陆皓东被捕后坚贞不屈，对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直认不讳，但拒不供出同谋。他慷慨陈词：“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sup>①</sup>表现了革命党人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11 月 7 日，他与会党领袖丘四、朱贵全同时就义。孙中山赞颂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清王朝丧钟也从此开始敲响。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此受到国内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 20 页，台北 1963 年出版。

外的关注。“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内外传媒上。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继续从事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由于清廷的严密侦缉，于 1896 年 10 月 11 日在伦敦被清廷英国公使馆诱捕。在被禁押的 10 余天中，孙中山镇定自若，沉着应变，最后在他的老师康德黎等的援救下得以脱险。虽蒙此大难，孙中山斗志更坚。被释后仍坚持留在伦敦，悉心钻研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理论等书籍，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考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开始酝酿民生主义的理论思想。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sup>①</sup>

在海外颠沛的孙中山始终关注祖国的革命斗争。1900 年 6 月，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等由日本乘船赴香港，在香港附近海面的船上召集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等研究起义计划。议定由郑士良联络会党在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孙中山转赴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渡海登陆指挥。台湾日本当局伪装支持起义，应允给以帮助。

10 月 8 日夜，黄福等率三合会 600 多会众在惠州三洲田地区发动起义，袭击新安县沙湾清军首战告捷。但由于饷械未到，起义军遂改变计划，转进闽南。途中屡败清军，斩获甚众。由于在日本所购军火上当受骗，台湾日本总督又态度大变，拒绝援

<sup>①</sup>《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2 页。

助，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被迫于 10 月下旬解散。郑士良等潜赴香港。颇具声势的惠州起义又告失败。

惠州起义爆发后，兴中会会员史坚如拟在广州暗杀广州总督德寿，可惜未能将德寿炸死。史坚如被捕后英勇就义，成为继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sup>①</sup>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孙中山和兴中会发动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以前同情革命者较少，加之保皇党淆惑人心，舆论界多把孙中山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而惠州起义之后，同情革命人越来越多，许多人为起义的失败而“扼腕叹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为举世所公认。这些都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 第三节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的创立

#### 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竞起

20 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式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痛感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纷纷走向了反清爱国的革命道路。集中分布于上海、东京等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译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原政》等相继出版。宣传革命的书刊大量涌现。比较著名的刊物有：《国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苏报》等。随着‘革命排满’民主思潮的激荡，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章炳麟、邹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章炳麟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发表的《革命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5 页。

军》、陈天华发表的《警世钟》、《猛回头》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痛斥了保皇党“不可革命”的谬说，热情讴歌了革命的正义性，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成为极富革命感染力的战斗号角，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伴随爱国运动的兴起和革命思想的传播，特别是进步留学生的纷纷回国，以留学生为骨干的青年知识分子建立的革命团体竞相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建的华兴会，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等。

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翌年在拒俄运动中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5月回国后，以创办新学为名，密集同志，谋划革命。同年11月4日是黄兴30岁生日，友人章士钊、刘揆一、翁巩等为他前来祝寿。席间，大家商议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翌年2月15日，借明德学堂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百余人参加，推举黄兴为会长。会议商定以“华兴公司”名义作掩护，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联络暗语，以“雄踞一省与数省并起”为发动革命为主要方法。同年10月，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但因密议泄露，起义未举即告失败。

光复会，又称复古会。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以蔡元培为会长。参加者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知识分子。该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组织暗杀和革命暴动为主要方法。光复会成立后，曾联络会党准备在浙东发动起义，以响应华兴会的行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起义也被迫终止。

科学补习所，是武汉地区的反清革命组织。1904年，吕大森、曹亚伯、时功璧及加入湖北新军的张难先、胡瑛、朱元成等人在武昌聚议，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遂决定租定会所，

建立组织，取名科学补习所。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到会者30多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sup>①</sup>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其章程宗旨为：“集合各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的机构。胡瑛任该所经理，吕大森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张难先等。该所的显著特点是重视新军工作，经常介绍青年学生和会党分子投身入伍，接受军事训练，并在新军中开展宣传工作。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即决定发动起义，以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因华兴会事败，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关系暴露，受到清军搜查，遂于次年改组为“日知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除上述3个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外，其他省份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如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的益闻社、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励志学会、江西的易知社、贵州的科学会、云南的誓死会、四川的公德社、广东的群智社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则有广东独立协会、支那亡国纪念会、军国民教育会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 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政纲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刺激下，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要求日趋强烈，于20世纪初年掀起了第一次留学热潮，其中留日学生占绝大多数。国内许多为清政府所不容的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也纷纷亡命日本，从而使日本成为反清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建立了许多反清小团体。这些团体大都按籍贯组成，尽管反清目标相同，但活动分散，意见不一，门户之见较为

<sup>①</sup>《警钟日报》，1904年7月8日。

严重，从而限制了战斗力的发挥。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各革命团体在反清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同一思想理论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一些进步报刊也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要求。如颇有影响的《浙江潮》即提出了“非省界”的观念，要求打破地域界限，“联合建立统一团体”，建立一个“中国本部统一会”。<sup>①</sup> 陈天华在《猛回头》和《警世钟》中，也呼吁“同胞弟兄结成同盟”；“大家合作一个大党”。<sup>②</sup> 这些都说明，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的自觉要求。但由谁来领导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呢？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其革命资历和威望，更以其宏富的三民主义思想理论取得了统一革命组织，“合成一个大党”的资格。

经过对革命经验的反思和与一些知识分子就革命方法的争论，孙中山的思想亦有了重要变化，意识到知识分子中蕴含的革命潜力，开始把宣传组织工作的重点，从海外华侨、会党逐渐转移到在日本、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身上。1905年春，旅欧学生贺之才等告知尚在布鲁塞尔的孙中山，说在东京同志甚多，可以发展，并给孙中山作函介绍李书成、但焘、时功玖等在日学生。孙中山遂决定去日本东京发展革命力量，以便“召集同志，合成大团”。<sup>③</sup>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数日后转赴东京，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与黄兴首先见面。孙中山“力陈革命要先团结力量之义”，得到黄兴赞同。7月28日，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华兴会领袖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编辑部晤谈，孙中山清辩滔滔，再次力言团结之必要，众人均表赞成，从而确定了

① 《浙江潮》第3期，1903年4月17日。

② 《陈天华集》第45页，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出版。

③ 张永福：《华侨与创立民国》第9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兴中会、华兴会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决策。

7月30日，在东京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70余人，在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冯自由、马君武、朱执信、田桐、汪精卫等重要人物均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演说中突出强调了各派革命党人合组新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在讨论新团体名称时，孙中山建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提议称“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又有人提出，组织名称加上“革命”二字，党员行动多有不便。经过讨论，确定联合后的新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同盟会”。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最后，与会者在黄兴提议下，署立盟书，宣誓：“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有渝此，任众处罚”。会议还推举黄兴、蒋尊簋、马君武、程家桢、陈天华等起草会章。

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灵南日人坂本金弥家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与会者300多人。大会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总章程》，规定了组织名称、宗旨、会员的权利义务、本部及各地区组织系统等项。会议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设本部于日本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执行部由总理统辖，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会计、调查等6部。孙中山指任黄兴为庶务，总理不在时，由庶务黄兴代理一切。此外选举产生了司法部、评议部工作人员，汪兆铭为首任评议部部长，邓家彦为首任司法部部长。会议还决定在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建立东、西、南、北、中5个国内支部，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建立4个海外支

部。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成立不到一年，会员总数逾万人。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系统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中国民主革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后说，同盟会集合了中国饱学文武之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sup>①</sup>

为了更有力地指导革命斗争，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又对其政治纲领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阐发。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义”。一年以后，孙中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上又把“三大主义”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三民主义”就成了革命党人的旗帜。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盟会宣言指出：“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光复我民族的国家”。就是说要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解除国内的民族压迫，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并非狭隘地排满，而是重在夺取国家政权。他曾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民族革命的缘故，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sup>②</sup>以反满兴汉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推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的产物，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特点，曲折地表达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进步作用。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创立民国”，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国民均有参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视民权主义为“政治革命的根本”。他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他主张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颠覆“恶劣政治的根本”——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说：“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sup>①</sup> 孙中山主张的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标的政治革命，集中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压迫，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

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鉴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极其不合理性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孙中山认为中国既应效法西方，又必须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因此，主张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革命。其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这种改良性的办法事实上不能预防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因此，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时，说平均地权的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sup>②</sup> 它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三民主义体系的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系统的革命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体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战斗旗帜和动员广大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武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三民主义政纲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